

曾国藩全书



曾国藩

及其幕府



〔下〕

远方出版社



曾国藩全书

主编 梁 勤
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张阿荣

曾国藩全书

主编：梁 勤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大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：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216.5 字数：5100 千字

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 套

ISBN 7 - 80595 - 769 - X/K·27

定价：748.00 元 (全 25 册)

第二卷 曾国藩幕府的重要人物

六、刘 蓉

刘蓉，字孟蓉，号霞仙，1816年（清嘉庆二十一年）出生于湖南湘乡乐善里。其父刘振宗，虽未取得过显赫功名，但是一位“恢奇有才识”的饱学之士，蛰居乡间却有胸怀天下之志，对世事人情看得比较透彻。1845年前后，曾国藩正在翰林院做官，西方列强虽已入侵中国，引起了清朝封建统治秩序的一些变化，但国内阶级矛盾尚未发展到总爆发的地步，刘振宗却独具见识地对当时与刘蓉一起问学的曾国荃说：“天下之乱已兆，无有能堪此者。其吾涤生乎？君与湘阴郭君（指郭嵩焘——笔者注）及吾家阿蓉，皆中兴之资也。”从后来这几个人的情况可知，刘振宗的预见得到了证实。1853年初曾国藩奉旨出山赴长沙督练湘勇之时，刘振宗又以大义促刘蓉辅佐曾国藩，并送另一个儿子刘蕃从军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为敌。刘振宗身上体现出的这种以天下安危为己任的积极入世精神，在一定程度上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刘蓉的人生旨趣所向。

刘蓉生长在比较富裕的家庭，不愁衣食，从小聪明好学，但他生性自负，不肯随从时俗以应科举。科举致仕，这是千百年来

中国正统知识分子赖以建立功名的一条道路。因刘蓉的父亲比较尊重儿子的选择，不是强制其读死书，重视的是真才实学，从而刘蓉在 30 岁的时候还没有中得秀才。然而，刘蓉讲求学问与现实生活问题的有机结合，注意通过治学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，用以充实自己的才学，增长“治国平天下”的本领。“思一用其学术以兴起教化，维持天下之敝，不乐贬道以求仕进”，其实际学识已传遍湘乡内外，文人士子均刮目相看。1834 年，刘蓉游学于长沙岳麓学院，结识了正在这里深造的曾国藩和郭嵩焘，相见之后三人甚感意气相投、志趣相同，遂拜帖订交为挚友。据黎庶昌的《曾国藩年谱》道光十四年一条记载说：“是岁始见刘公蓉于朱氏学舍，与语大悦”；又据钱基博《近百年湖南学风》说：刘、曾、郭“欣然联欢为昆弟交，以问学相切劘”。1838 年，曾国藩考中进士入翰林院之后，怀着无限思念之情给远在家乡尚未中秀才的刘蓉寄去诗作一首说：“清晨采黄鞠，薄莫不盈襕。宁知弟昆好，忍此四年别。四年亦云已，万事安可说？昔日初结交，与世固殊辙。垂头对灯火，一心相媚悦。炯然急难情，荧荧光不灭。”次年，曾国藩回到故乡后，特意到刘蓉家里去看望他，勉励其攻读史书，勤奋写作。四年后，当他在京城收到刘蓉给他的书信，见其学业大有长进，在极度兴奋之余以刘蓉进业之速来规约自己勤奋治学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昨日接霞仙书，恳恳千余言，识见博大而平实，其文气深稳，多养到之言。一别四年，其所造遽已臻此，对之惭愧无地，再不努力，他日何面目见故人耶！”与此同时，曾国藩致书刘蓉，初步阐发其对文以载道、文道并重的基本主张，希望好友对此提出有益的意见。在此信一开头，曾国藩就向刘蓉表白，我今天与你讨论学术的见解主要是受了你的启发：“去岁辱惠书，所以讲明学术者，甚正且详，而于

仆多宽假之词，意欲诱而进之，且使具述为学大指，良厚良厚！”进而，他向刘蓉明确表示要调和汉学与宋学之争，兼取二者之长，将文以载道、文道并重之学发扬光大，“于汉、宋二家构讼之端，皆不能左袒，以附一哄；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，尤不敢雷同而苟随。”在寄给刘蓉的诗作中，则集苏东坡句为联以赠，“此外知心更谁是？与君到处合相亲”，且希望他能在科途上奋进一番。通过书信往返，两人之间的友谊更趋深化，对双方学术主旨也了解更多。此时，刘蓉虽是一位尚未中秀才的“草野之民”，但大名鼎鼎的曾国藩却对他的才学给予了高度评价。

1844年秋天，当曾国藩得知其弟曾国荃想跟刘蓉一起作伴读书的消息后，在给几位弟弟的书信中首先表示“此意甚佳”。认为刘蓉“近来读朱子书大有所见”，如果他的“言语容止、规模气象”都好的话，“则直以为师可也，岂特友之哉！”进而，又提醒诸弟不要急急于科名一途，关键在于有人品有才学，“如霞仙今日之身分，则比等闲之秀才高矣。若学问愈进，身分愈高，则等闲之举人、进士又不足论矣。”在这里，曾国藩不是以功名有无、高低来看待刘蓉，而是以才学的高深来对刘蓉予以评价和肯定。就刘蓉本人而言，对科举应试之事仍然看得很淡薄，在与曾国藩的书信往返中受到启发激励，对于学术方面的兴趣比从前更加浓厚，带着问题深入钻研先王之学，对汉、宋二学的优长劣短作了比较疏理，然后将自己的心得体会写信给曾国藩交换意见。从这期间刘、曾二人往返信件内容可知，刘蓉侧重于对宋学的推崇，而对汉学的不足之处提出了批评；曾国藩则主张对汉、宋二学兼采博收，调和之意比较明显。据曾国藩在1835年《答刘蓉》的书信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二人切磋学术的基本内容所在。他首先肯定刘蓉“信道力学，又能明辨王氏（指王阳明——笔者注）之

非，甚盛甚盛”，进而说明迟迟未及复信的原因是“性本懒怠”，对学问研究不深，害怕见笑于好友，经过多方考察研究圣贤之学后，今天才决定回复这封信，重点对于仁义之说，“略陈大凡，吾子取证而裁焉”，即阐述一个大概，希望能得到你刘蓉的批评指正。曾国藩明确指出，“学者何？复性而已矣；所以学者何？格物诚意而已矣。格物则剖仁义之差等而缕晰之，诚意则举好恶之当于仁义者而力卒之。”要做到格物诚意，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古圣先贤如“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之学岂有他与？即物求道而已。”从而，曾氏主张应将宋学与汉学的优长吸取过来，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。他自己的远大志向是：“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，使凡物各得其分；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，行道于妻子，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。”他反复称道刘蓉对学术的钻研精神实在可嘉，“今足下崛起僻壤，乃能求先王之道，开学术之郛，甚盛甚盛”，同时又希望他能不偏执一途，把眼光放得更加开阔一些，广泛吸取各家学说之优长，用以丰富自己的学识。这样，虽未取得显赫功名，亦有可能成为一位千古传颂的大儒。毫无疑问，曾国藩学业的长进，离不开好友刘蓉的启发帮助；而刘蓉的“奇才”之名，通过曾国藩在友朋中的大力宣传，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。1850年，刘蓉养晦深山，将其室取名为“养晦堂”。曾国藩得此消息后即作《养晦堂记》：“吾友刘君孟容，湛然而严恭，好道而寡欲。自其壮岁，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。既而察物观变，又能外乎名誉。于是名其所居曰‘养晦堂’，而以书抵国藩为之记。”曾国藩对刘蓉学术主旨和人生志趣的中肯评价，进一步扩大了刘在士大夫阶层的声望。从而，湘乡知县朱孙诒认为刘蓉是位了不起的人才，特地嘱咐刘的父亲督促他参加科举考试以取得功名。这样，一向讲究孝友之学

的刘蓉，不得不于1851年遵父命参加县试，举为首名，始补县学生员。此时，刘蓉已经35岁了。随后，因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风暴席卷南中国大地，封建统治秩序大乱，客观环境既规定了刘蓉不可能安坐书斋专心致力于治学，也决定了刘蓉不可能继续朝着正规的科举之途向前迈进。

1872年春曾国藩病逝，刘蓉曾挥泪作挽歌百首，其中第三首说：“海内论义我最先，从容文酒记岁年。可怜鹤发支离叟，志向人间哭逝川。”此处所说的一个“义”字，突出地体现在刘蓉劝曾国藩“墨经从戎”和应曾国藩之约入其幕府的事例之中。

1852年夏秋间，太平军以破竹之势先后进兵湖南及省城长沙。闲居乡间的刘蓉从维持封建统治的本能信念出发，与罗泽南等人在湘乡设立团练局用以自卫。此时，因丁母忧回到家乡的曾国藩正一意守制以尽孝思，尚未投身练团自卫的行列，从而刘蓉数次去信希望他迅速赴局主持一切。对此，曾国藩在给刘蓉的书信中首先说明之所以迟迟未能“赴局陪诸君子之后者”的原因，一是安葬完母亲之后，数月间孝服在身，不便“缟素而入公门”；二是“局中要务，不外训练武艺、催收捐项二端”，而本人对这两者均不在行，“是以再四踌躇，迟迟未出。”进而，他向刘蓉表示，同心合力保护桑梓是大义之责，决无袖手旁观之理，打算在百日之后亲赴县城，“一则叩谢石樵先生（指时任湘乡知县朱孙诒）枉吊敝庐之劳，一则到局与诸君子商榷，以明同舟共济之义。”尽管他当时对于团局章程一无所知，但他建议刘蓉等人，切实注意“壮勇贵精而不贵多，设局宜合不宜分。”在城内设一总局，选敢死之士400人即可应付事变，另在湘潭、宁乡两县交界处所多设探报，有事即可随时派兵前往镇压。曾国藩的这些建议，后来多被县令朱孙诒等采纳。

1852年12月下旬，太平军相继占领汉阳和汉口，清中央朝廷慌了手脚，于次年1月8日颁旨命曾国藩帮同办理湖南团练事务。是月21日，曾国藩正式奉到廷寄谕旨，此时武昌已被太平军攻占。接到朝廷旨令之后，曾国藩考虑再三，草疏恳请在家终制，并拟具呈湖南巡抚张亮基代奏。缮就未发，适逢张亮基派专人持函恳请其立即出山视事，好友郭嵩焘亦到湘乡曾家当面力劝“出保桑梓”。刘蓉则在给曾国藩的一封长信中，希望他以“救治乱”为己任，不应仅“托文采庇身”。该信首先指出，道丧而文敝，能够得到有才能的人“起而振之”，自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然而，这只不过是“士君子”不得志的时候之所作所为罢了。你曾国藩“既已达而在上矣，则当行道于天下，以宏济艰难为心。”如果仅“托文采以庇身”，那么政纲就会不问；如果仅“藉诗酒以娱日”，那么吏事就会不修。这样一种陋习代代相承，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，希望你曾国藩不要再蹈袭覆辙，应将圣贤之学落实到行动之中。“大疏所陈，动关至计；是固言人所不能言、所不敢言。然言之而未见其效，遂足以塞大臣之责乎？国是未见其益，而闻望因以日隆、度贤者之心，不能无歉然于怀也。”你曾国藩“具有匡主济时之略，先忧后乐之怀”，其才识足以任天下大事，希望你“陈古训以自鉴而不矜于气，规大道以自广而务宏其度，集思广益，庶几近之。”你常常所说的“规永叔（欧阳修）、子瞻（苏轼）之节概以自多，采退之（韩愈）、鲁直（黄庭坚）词华以自豪”，则是天下无事、太平盛世所要做的，“非当今之所急”。你所坚守的“不爱钱”，“不惜死”的处世态度，如果仅以此表白自己的心志是可以的，然而“若以慰天下贤豪之望，尽大臣报国之忠”，那就未免流于肤浅了。这是因为，“大臣之道”不仅自己要有“廉介之操”，更重要的在于以自身的

学识和人格去吸引、去动员、去驱使天下“智勇才辩之士”自觉加入“治国平天下”的行列，为之拼却性命而在所不惜。

曾国藩觉得刘蓉所说很有道理，于是消除顾虑，1853年1月25日从湘乡启行赴长沙。

在此前后，罗泽南、江忠源、王鑫等好友率领团勇纷纷开至省城，与之共商大计。然而，在最初半年多的时间里，由于曾国藩系书生出身，手中无直接可资调动的一兵一卒，更因绿营兵将骄横不可一世，根本不把曾国藩看在眼里，处处与之为难。在这助手异常缺乏之际，自然想到了至交好友刘蓉和郭嵩焘。因此时刘、郭二人均不在自己身边，刘随曾至长沙没有多久即因病回到湘乡老家，郭则随江忠源转战江西三个月后亦回到湘阴去了。曾国藩于是怀着求人急切之心于是年11月写信给刘蓉说：“吾不愿闻弟谭宿腐之义理，不愿听弟论肤泛之军政，但愿朝挹容晖，暮亲臭味，吾心自适，吾魂自安。”郭嵩焘此时“深藏洞中，亦当强之一行。”这是因为，天下大乱已到了极点，我已奉命而出，唯独你刘蓉和郭嵩焘能够晏然无所事事吗？希望你刘蓉立即出山相助。同时，又致信郭嵩焘应约以当重任。话已说到这个地步，刘蓉和郭嵩焘无由可辞，相继来到曾国藩身边，共同筹划有关练兵、集饷等大政方针。但两人与曾国藩约定：“服务不辞，惟不乐仕宦，不专任事，不求保举。”曾国藩深知刘蓉与郭嵩焘的脾性，只好答应，但嘱咐管理银钱所的主计说：“郭、刘二君，吾兄弟交，不与众同。薪水惟所支用，不限数也。”然而，刘、郭二人随曾国藩数年谨守初衷，从未支取过一文钱。对此，曾国藩深感不安。在1856年致刘蓉的书信中无不感慨地提到此事：“乃者凡在敝军人员，一技半职，皆得月分禄养，薄沾微润。惟吾弟与云仙不议月俸，出比龙见，而蜕若蝉清。盖国藩不欲以职事累

两君，亦不以荣禄相酬。使两君得遂其来往自由之身，此鄙人之微意。而吾弟与云仙所默喻，而便安之者也。”1855年秋，刘蓉独领一军配合罗泽南先后攻下湖北崇阳、通城等重镇，曾国藩据其功想举荐刘蓉，当即遭到刘的反对。曾国藩说：“此亦古人之常，且幕客皆叙劳，君何得独不尔邪？”刘蓉却说：“汉代萧、朱、王、贡，以转相汲引为贤，盖踵战国余习，非友道之正。士各有志，奚必以此相强？”曾国藩只好尊重刘蓉的意见，以后再也没有直接举荐过他。曾国藩之所以能统率数十万大军，经过十多年的南征北战，最终将势力遍及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镇压下去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的身边聚集了诸如刘蓉等一大批军政人才。这些人淡泊名利，讲究道义信守，注重人品学识的修养和弘扬。这对于在封建纲常伦理秩序大乱的环境下，维系社会人心风俗的纯净与稳定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。

刘蓉被曾国藩“挟持”再度出山之后，先是遵曾氏之嘱到达长沙助王鑫整顿湘乡练勇，随后来到衡州与曾国藩、郭嵩焘、罗泽南共商操练湘军水陆各营事宜。1854年2月25日，刘蓉随曾国藩率领1.7万余人的湘军水陆各营同时并进长沙，于3月间一度夺得湘北重镇岳州，4月上旬兵败折回长沙。月底，组织靖港、湘潭战役，湘潭虽获胜，靖港方面却输得很惨。随后，刘蓉助曾国藩在长沙着手整顿湘军，凡溃散之勇不再收回，溃散营哨的营官哨长也一律裁去不用，留下精锐5000多人。进而，在调回罗泽南、李续宾部至长沙的同时，又令塔齐布、杨载福、彭玉麟等大量招募新勇，使湘军很快扩展到一万来人，加上从广东、广西奏调而来的水陆各营共计达2万之众，“规模重整，军容复壮”。经过切实休整之后，曾国藩与刘蓉等决定以水师为依托，于是年7月下旬向岳州太平军驻地再次发起攻击，最终占领岳州，迫使太

平军势力退出湖南省境。随后，遵照清廷指令，湘军准备越境援鄂直捣武昌。刘蓉因家中有事回湘乡一段时间后，于9月间重新回到曾国藩身边。湘军先后攻占武昌、汉阳，10月下旬分三路东进江西、安徽。经过三个多月的激战，于1855年2月上旬兵临九江城下。九江为太平军重点设防之地，湘军因而遭到惨败，曾国藩的座船被太平军俘获，“文案全失”，连咸丰皇帝奖赏给他的黄马褂、白玉四喜搬指、白玉巴图鲁翎管、玉靶小刀、火镰等件，均成为太平军的战利品。曾国藩为此羞愧交加，投水欲寻自尽，被左右救起之后，又想策马赴敌以死，被刘蓉、罗泽南等力劝乃止。自此之后，湘军势力被迫分割成四个部分：水师分成内湖、外江两支而不能会合，塔齐布、罗泽南部陆师分驻九江和江西腹地。刘蓉随曾国藩大营驻南康、南昌一带。此时，曾国藩因军事上的节节失利，心绪极度不佳。幸有刘蓉陪伴左右，“夷险共之”，才减去几丝忧愁。是年7月，太平军在湖北的军事方案基本实现之后，从湖北东南部回师江西，一举占领义宁（今江西修水县），对坐镇南昌的曾国藩造成紧逼之势。9月中旬，罗泽南亲至南康（今江西于都）会晤曾国藩、刘蓉于座船之上，提出自己的看法：要想规取安徽、江苏，就必须首先复占武昌；要复占武昌，就必须首先控制上游之势，同时江西方面的压力也有可能得到缓解。他提醒曾国藩，如果被动株守江西，等于束手待毙。进而，他请求允许自己率军从义宁出发，进攻崇阳、通城、增援武昌；如果得手，则挥师东下，进击九江，使内湖、外江两支水师声息相通。曾国藩采纳了罗泽南的建议。并从塔齐布旧部中拨普承尧、彭三元率领的宝勇1500人交罗泽南统制。

刘蓉很不放心曾国藩的安全，对曾说：“公所赖以转战者，塔、罗两君。今塔公亡，诸将可恃独罗公，又资之远行，脱有缓

急，谁堪使者？”曾国藩从容回答：“吾固知其然，然计东南大局宜如此。今俱困江西无益，此军幸克武昌，天下大势犹可为，吾虽困犹荣也。”罗泽南临别之时，刘蓉与郭嵩焘送至柴桑村。刘无不忧虑地说：“江西三面距贼，此军去，必不能支，计将安出？”罗泽南对曰：“曾公所治水师，幸能自立，但留曾公一人在，均无足计。”郭嵩焘则说：“曾公意求有益于天下大局，其视此身如鸿毛，不自今日始也。”罗泽南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天苟未忘本朝，此老必不死。”随即，三人“相与叹息而别”。此时，太平军方面也组织大批力量援助武汉，前锋以锐不可挡之势先后击败李孟群、胡林翼等部清军。于是，罗泽南重新部署援鄂之师。一直呆在曾国藩身边的刘蓉也自告奋勇加入远征的行列。部署妥当的这支援鄂湘军分为左中右三支主力：罗泽南领中营，刘蓉领左营，李续宾领右营，另有普承尧、彭三元所领宝勇营，合计 5000 余人，于是年 10 月上旬从义宁向西挺进，至 11 月下旬，先后攻占崇阳、通城、羊楼司等地，随后向蒲圻发起攻击。此战异常激烈，刘蓉的弟弟刘蕃力战身亡。

自 1855 年冬离开曾国藩大营回到家乡之后，刘蓉因丧弟之痛深深刺激着心灵，甚感行兵打仗是一件凶多吉少的事情，决心蛰居深山，在侍奉高堂、督教子侄的同时，专心做点学问。从而，他对曾国藩、胡林翼等人的多次邀请，始终没有答应，甚至于清中央朝廷颁旨转令他父亲刘振宗做他的工作，也未引起他的心动。就这样，直至 1860 年进入骆秉章幕府这前后五年时间里，刘蓉基本上是在湘乡老家过着读书做学问的日子。

是年 6 月底，湘军全力规取安徽，前线军情异常紧迫，清廷颁旨促曾国藩立即服阙视军。原想久住家乡的曾国藩在胡林翼、骆秉章等人的急催之下，不得不作再度出山的打算。这一次，他

终于说动好友刘蓉与之同行。7月20日，刘蓉随同曾国藩及郭意城、曾纪泽从湘乡县城启行，于22日到达省城长沙。次日，刘、曾二人与骆秉章、左宗棠、郭意城、王人瑞等会商军事，札调萧启江、张运兰、王开化等部湘军，由江西抚州等地拔营进驻铅山县河口镇。曾、刘等人则于29日从长沙由水路东下，途经岳州，至8月3日抵达武昌。在武昌逗留十来天中，刘蓉随曾国藩游览了附近名胜，更多地是与胡林翼等会商军谋。刘蓉此时的心情异常舒畅，对有关用兵方略、粮草筹措等问题，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，获得胡、曾二人的采纳。11月，刘蓉随曾国藩一行从武昌启程由水路向九江进发。途中，刘、曾二人在众多师友的撮合之下，决定了两家联姻的这件大事。

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自元配夫人贺氏因难产死去，一年来尚未续弦。刘蓉出于对老友曾国藩的情谊，主动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曾纪泽作继室。曾国藩当然感到非常高兴，不顾旅途劳累和军情紧迫，于1858年8月14日特请彭玉麟、唐训方作媒，正式定下这门亲事。一个黄花闺女给人家做继室，这在重名声、讲礼节的封建社会是不多见的，由此足见刘蓉与曾国藩的交情非同寻常。这不仅反映出刘蓉对曾纪泽人品和学识的厚爱，更突出地表现了刘蓉与曾国藩的友谊至深。刘蓉的女儿后来与丈夫曾纪泽及家人的关系处理得十分融洽，很受曾家人的尊重。她先后生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，在曾纪泽1890年去世后，她严格管教儿女们行正学好，为继承曾、刘二家传统家风起了重要作用。

曾国藩认为，让刘蓉老呆在乡间不是个办法，他的才识没有发挥太可惜。然而，如强行让他“为统领恐其不耐劳”；举荐他当地方官，因是“亲家例须回避”，便打算劝胡林翼从中帮忙。正当曾国藩为刘蓉出处紧张筹谋之际，传来了清廷命刘蓉入湖南

巡抚骆秉章幕府参赞军事的谕旨。这次，刘蓉没有再作推托，欣然应命出山。

此时，受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影响的云南人蓝大顺、李永和自1859年在家乡昭通揭举义旗之后，进入四川省境，占领自贡盐场及附近州县，人数发展到30余万，活动地区达50余州县。1860年下半年，清廷曾先后拟派曾国藩、左宗棠坐镇四川，因东南地区军事紧迫作罢。是年底，骆秉章受命入川，于次年担任四川总督，全力镇压蓝、李农民起义军。刘蓉随同前往，为其出谋划策，忠心辅佐；骆秉章则对刘信任不疑，有关选将练兵、整饬吏治等事均言听计从，使其才识得到充分发挥。

为了尽速平定全蜀，刘蓉通过分析当时所处形势，向骆秉章提出了集中势力镇压蓝大顺、李永和部农民起义军的建议。据吴棠在《陈已故督臣功绩疏》中叙述，刘蓉随骆秉章入川之时；“滇匪李永和巨股居青神，而分股窜扰眉州、嘉定、雅邛、叙泸等处；”“蓝潮鼎巨股由潼川窜攻绵州，而分股窜扰江油、彰明、绵竹、安县、梓潼各属。”此外，“何与顺、张国富、何鸿蚊等分扰川东、川南各州县，……全属几无完土，楚军节节进剿，先殄何兴顺股匪于定远县，遂由顺庆进扎潼川”。至此，刘蓉提出了全盘用兵方略：他认为，“贼股虽多而强悍无过李、蓝二酋，能除此二酋，则余贼不足平”。与此相适应，“用兵次第，又宜先解绵州城围以收聚歼之功，然后鼓行而南，以成破竹之势。”经过三四个月的具体实施，刘蓉的这个用兵方略产生了初步效果，因功授四川布政使职。按清制，布政使的职责是专管一省财赋、地方官考绩等事。从而，刘蓉紧紧围绕镇压农民起义这个军事斗争的中心，悉心“筹划军储，遣撤游勇”，体现了突出的从政才能。至1862年春，李永和、蓝大顺部农民起义军被基本镇压下去。然

而，就在刘蓉协同骆秉章全力进击李、蓝农民起义军的紧张时刻，石达开部太平军于1861年10月下旬竖起远征四川的旗帜，次年2月中旬进抵四川境内，队伍得到进一步扩大。刘蓉与骆秉章又面临着严峻的军事形势，不得不加以认真对待。

然而，敌对阶级之间的大搏斗，是不会讲信用的，清军在石达开“舍命以安三军”的举动形成后，于19日夜将太平军余部2000余人残酷杀害于大树堡寺庙之内。几天后，石达开被押解至成都，囚禁在科甲巷臬台衙门的大牢之中。临刑之前，石达开大义凛然，视死如归，令骆秉章、刘蓉不得不对他敬畏三分。刘蓉在给友人的书信或奏折中，多次反映出这种心情说：石达开具有大丈夫气魄，言行不亢不卑，无丝毫贪生怕死之气，临刑之际，“神色怡然”，确属难得。刘蓉能对石达开作出这样的评价，湖湘实学精神在他身上体现得是比较明显的。

1863年7月，湖广总督官文鉴于刘蓉在四川的表现，根据胡林翼的多次举荐，专折上奏清廷，说刘蓉“晓畅戎机，勇于任事”，底定滇、川，功绩卓著，应令其“独当一面，俾资展布”。如蒙恩准，则请令其“督办陕南军务”，与荆州将军多隆阿“各张一帜”，以收朝廷“绥靖边疆”之功。8月，清廷颁旨命刘蓉督办陕南军务，不久授以陕西巡抚重任。曾国藩得知这个消息之后，心中感到非常高兴，但因相距遥远，讯息不灵，传闻陕甘敌势正盛，官军出师不利，即致书刘蓉：“但闻开府秦中，使节未行而前敌诸军败挫，汉中沦陷，旌纛暂驻巴州，待新军四集，由宁、羌节节进剿，口耳遥传，粗得梗概而已”，希望他认真对待，好自为之。

刘蓉奉命巡抚陕西之初，所处形势异常复杂。陕甘一带回民起义军和捻军在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影响之下，势力非常活

跃，转战各地，对西北边陲封建统治秩序造成了危机。加之，陕西连年天灾，老百姓饱受兵祸和饥饿的苦难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激烈。刘蓉接篆任事之后，在全力部署军事，对回民起义军和捻军进行讨伐的同时，大力整饬吏治，革除弊政，“以凤州道黄辅展精于吏事，使经理回民叛产，设法开治”，触犯了一些不法官吏的利益，从而对其恶意中伤，企图把他赶出陕西。1865年夏，编修蔡寿祺上奏朝廷，指控刘蓉以钱财攀附权贵而获得提拔晋升，清廷即派罗惇衍、瑞常两尚书前往查办。刘蓉淡泊名利，无意做官，自然对蔡寿祺的不实之词表示愤恨不已。他在专折中辩白说：蔡寿祺纯属挟私报复，恶意中伤。因为蔡曾在四川自刻关防，擅自征调乡勇，聚众横行。我刘蓉曾明确宣布对其加以驱逐，所以他怀恨在心，才罗织造词来陷害我。进而，刘蓉就自己的经历对蔡寿祺指控的“夤缘贿进”这几个字给予了严词批驳。他说：凡是攀附权贵，拉关系往上爬的人，一定是操守不佳，品质败坏，名利之心异常浓厚。我刘蓉自幼不太用心科举，一向淡泊功名富贵，“志安贫贱”。应好友曾国藩之邀而出“襄其军事”，又与罗泽南等领兵转战赣、鄂各地，弟刘蕃殒命疆场，且老父多病，于是解甲归田，以耕读为业。咸丰十年底由胡林翼举荐，奉旨以知府归部铨选，赏三品顶戴，署四川布政使，随后擢补陕西巡抚。而蔡寿祺不顾事实，制造攀附权贵以求升官的谎言，肆意对我加以诋毁，实在可恶可恨。我刘蓉“起自草茅，未趋朝阙，于皇上左右亲贵之臣，未尝有一面之识；政府枢密之地，未尝有一信之达。”这是朝廷大臣乃至皇上、皇太后所一清二楚的，“夤缘之谤，将何自来？”敬乞皇上严加查察，推究根由，如果我刘蓉确有攀附权贵、以求升官的情事，“即请严治臣罪”。反之，如果皇上听信蔡寿祺之言而不对他严加惩治的话，那么就让我刘蓉